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Distr.: General
31 May 2023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通过的关于第 1049/2021 号来文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Janbo Atilaw Melie(由 AsyLex 的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21 年 1 月 24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4 和第 115 条作出的决定, 已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23 年 5 月 5 日
事由: 递解至埃塞俄比亚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
《公约》条款: 第 3 和第 16 条

1.1 申诉人 Janbo Atilaw Melie 是埃塞俄比亚国民, 出生于 1982 年 12 月 23 日。他在瑞士申请庇护, 但被驳回。他面临被递解回埃塞俄比亚, 并认为缔约国将他递解出境将违反《公约》第 3 条。缔约国已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1 款作出了声明, 自 1986 年 12 月 2 日起生效。申诉人由律师代理。

1.2 2021 年 1 月 24 日, 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 114 条, 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报告员行事, 要求缔约国在申诉审议期间勿将申诉人递解至埃塞俄比亚。

1.3 2021 年 1 月 27 日, 缔约国通知委员会说, 依照既定程序, 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已请有关部门不要采取递解申诉人的任何步骤, 从而在委员会审议申诉时, 保证申诉人留在瑞士。

* 委员会第七十六届会议(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5 月 12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托德·布赫瓦尔德、克劳德·海勒、埃尔多安·伊什詹、柳华文、前田直子、阿娜·拉库、阿布德拉扎克·卢瓦内、塞巴斯蒂安·图泽和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2005 年，申诉人加入埃塞俄比亚前反对派政党团结民主联盟党，又称“Kinijit”。在这一背景下，他参加政治示威活动。2005 年 6 月，他在工作场所被逮捕，并被关押在亚的斯亚贝巴的 Maekelawi 监狱。一个月又 20 天后，他获得保释。获释后，他被警告，如果他再次犯罪，将会再次入狱。申诉人因为担心再次被捕，一个月后离开亚的斯亚贝巴，到 Negele Borena 居住。尽管当时有关部门不再找他的麻烦，他生活在对再次被捕的恐惧之中。2012 年，申诉人在一家商店工作时，利用了其雇主提供的出国前往苏丹的机会，逃离了埃塞俄比亚。

2.2 2012 年 7 月 4 日，申诉人抵达瑞士，并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在瑞士提出庇护申请。他在当天以及 2012 年 7 月 20 日和 2014 年 6 月 12 日得到听审。2014 年 6 月 17 日，联邦移民局驳回了他的庇护申请。移民局指出，申诉人在 2005 年被拘留之后，得以在亚的斯亚贝巴生活一个月、从有关部门获得新的身份卡并之后搬去 Negele Borena，在那里居住直至 2012 年离开该国，期间没有被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寻找或传唤——他的家人也没有因他而遇到麻烦——这表明他宣称曾经历的迫害已经结束。此外，如果申诉人面临严重的监禁风险，他合理的做法是一直躲起来，而不是寻找就业机会、住在相同的地点或与多人接触。

2.3 2014 年 9 月 8 日，联邦行政法院维持了联邦移民局的决定。它认定，除其他外，尽管申诉人宣称存在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但他获释后，直到 2012 年出国，在其来源国埃塞俄比亚的生活平安无事。法院认为，申诉人离开他的国家是因为他的雇主出售了他工作的商店并离开了埃塞俄比亚，导致申诉人失业。因此，法院认定，2004 年和 2005 年可能存在的迫害并非他 2012 年离开该国的原因。申诉人本人说，他在据称被捕后，在来源国不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此外，申诉人关于他流亡中政治活动的说法——尤其是他参与了一次集会——总体被认为没有充分证据支持。

2.4 2015 年 6 月 3 日，申诉人再次提出庇护申请，对此他提供的主要依据是他流亡中参加的政治活动，以及他陈述的事实，即 2014 年一家埃塞俄比亚法院因他未能到警察局报到，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发出逮捕令。¹ 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 2015 年 9 月 7 日的决定² 驳回了他的申请。秘书处认定，除其他外，用以证明在申诉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发出逮捕令的亚的斯亚贝巴警察局的文件只是一份毫无证据价值的复印件。因为就该文件的内容也存在疑点，秘书处认定，它整体上不具备证据效力。秘书处还认定，因为不能假定申诉人在离境时在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的注意范围内，鉴于他流亡中低调的政治活动，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不太可能将他认定为威胁。因为没有上诉，秘书处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2.5 申诉人表示，在瑞士，他是埃塞俄比亚驻瑞士人权和民主工作队的重要活跃成员。他定期参加其会议及其组织的反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抗议，他作为该工作队成员的主要责任之一是要求释放政治犯。申诉人也是某埃塞俄比亚和瑞士体育与文化协会十分活跃的成员。

¹ 申诉人表示，他从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名熟人处获得了这一信息。

² 联邦移民局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变为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

2.6 2020 年 2 月 6 日，申诉人被行政拘留，³ 以备乘 2020 年 2 月 28 日安排的航班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递解出境。他拒绝登机。散居在瑞士的埃塞俄比亚群体在位于日内瓦的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外组织示威活动，抗议他被拘留。因此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知道申诉人。此外，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长期拒绝向他发放旅行证件。

2.7 2020 年 9 月 11 日，申诉人以埃塞俄比亚局势大幅度恶化，他已成为知名政治反对派人士为由，提出复审申请。他提到对知名埃塞俄比亚抗议歌手 **Hachalu Hundessa** 的谋杀，以及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外为声援他而举行的示威。2020 年 9 月 18 日，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在审查埃塞俄比亚局势和申诉人的政治活动情况后，决定不受理复审申请，并下令将他递解出境。申诉人提起上诉。他的理由包括，秘书处告知的提交上诉时限有误。

2.8 2020 年 10 月 26 日，联邦行政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上诉。法院援引了 2018 年春以来埃塞俄比亚发生的政治变化——包括政府更迭——其中涉及所有政治力量的融合，尤其是反对派政治力量。它再次指出，申诉人在出国之前，在其来源国相安无事地生活了数年，在先前两轮庇护程序中，他也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处于该国有关部门的关注范围内。申诉人也未能表明，在其流亡中的政治活动方面，他多大程度上会被来源国的有关部门视为威胁。

2.9 法院尽管承认申诉人可能在大使馆外进行的示威活动中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因此被视为政治风险。申诉人临时旅行证件的迟发似乎是他逃避离开该国的义务所致，一定程度上也是过去逃避与来源国有关部门合作所致，还是他在此期间躲藏起来所致——先前签发的旅行证件在 2020 年 4 月后不再有效——即使对大使馆施加的压力似乎最终起到了一定作用。因此，法院表示，申诉人此后获发了有效旅行证件。此外，他来源国的紧张局势——尤其是一名知名歌手遭谋杀——不能证明申诉人面临真实和针对个人的迫害风险。申诉人也未能令人信服和证据充分地证明他在埃塞俄比亚没有社会和经济联系网络。对此，法院已经指出，申诉人曾提及自己在亚的斯亚贝巴和 **Negele Borena** 的生活，因此他与目前处于冲突中的提格雷地区没有关系。法院补充表示，一审的管辖法院确实给出了错误的提交上诉时限，但强调申诉人并未因此在法律上居于任何特定的劣势地位，因为他得以准备并提交上诉。

2.10 2020 年 11 月 15 日，瑞士有关部门再次试图在警察陪同下递解申诉人，但他拒绝登机。⁴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他被释放，2021 年 1 月 14 日，他再次被行政拘留，待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在两名安报警官和两名押送警官陪同下乘包机返回埃塞俄比亚。

³ 对申诉人的拘留令经由索洛图恩一家法院的决定下达，并随后于 2020 年 2 月 7 日、5 月 4 日、8 月 4 日、10 月 27 日和 11 月 30 日延长。签发拘留令是因为申诉人的行为，尤其是他多次失踪——2020 年 2 月 6 日，他在都柏林程序框架内被从德国转移到瑞士——他拒绝登上为他预订的航班，他在瑞士非法逗留数年，并一直拒绝返回他的国家，他的行为表明他仍在试图避免被递解出境。

⁴ 申诉人声称，陪同他上飞机的警官试图以暴力使他屈服：他们勒他的脖子并弄伤他的肩膀。他表示，自己仍然因所遭受的暴力而疼痛，但来文提交至委员会时，他无法提供医疗记录。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将他递解回埃塞俄比亚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 3 条享有的权利。他声称，尽管有联邦行政法院的意见，但仍有充分理由认为，如果他被递解，他将受到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的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3.2 申诉人援引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动荡来解释他对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任意对待或遭受镇压措施的担忧。自 2015 年以来，亚的斯亚贝巴的局势持续恶化，造成了普遍暴力。尤其是，埃塞俄比亚购置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监控系统之一，不仅监视其国内公民，也监视散居在外国的公民，居住在瑞士的埃塞俄比亚人也成为了网络攻击的目标。⁵因此，在瑞士的政治活跃人士可能在回国时遭受迫害，特别是鉴于埃塞俄比亚政权监视其在瑞士的国民。

3.3 申诉人重申，他曾强烈抗议应由埃塞俄比亚政府负责的侵犯人权和非法逮捕行为。因此他在散居于瑞士的埃塞俄比亚人中出名，而在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前反对驱逐他的示威活动后，他肯定在埃塞俄比亚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并将因此受到迫害。他还重申，在埃塞俄比亚，他是 Kinijit 党的成员并曾因此入狱。此外，他提及了递解将对他的精神健康构成的负面影响，并补充说，他可能成为进行中的内战的受害者。

3.4 申诉人辩称，由于联邦行政法院在其 2020 年 10 月 26 日的决定中所承认的错误，他只有五个工作日的时间来上诉，而不是法定的 30 天。尽管法院认为，由于申诉人得以在五天内提交上诉，他并未证明这对他显著不利，但申诉人称，考虑到提交上诉的时限缩短，他不得不在匆忙之中撰写上诉文件。因此，他缺少时间仔细研究他质疑的决定并更有效地突出表明自己如果被递解将会面临的风险。

3.5 最后，申诉人声称，鉴于他被递解时可能面临的虐待风险，他根据《公约》第 16 条享有的权利可能受到侵犯，⁶因为他将会以所谓四级递解的方式被递解，这一程序饱受民间社会、政治人士、人权维护者和委员会的批评。他认为，如此对待最弱势和深受创伤的人——即给他们带上枷锁数小时，用轮椅运送，没有行动自由，甚至强迫他们配戴头盔来控制头部的位置——只有描述为过度才恰当。飞机上没有医生的情况下，他将无法接受任何可能需要的医疗援助，这本身就构成不人道待遇。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21 年 10 月 18 日，缔约国移交了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它援引委员会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第 38 段，该段表示，申诉人必须表明，如果被遣返回国，其遭受酷刑的危险是针对其个人、现实且真实的。因此，仅凭某个民族成员的身份不足以确立这样的危险。⁷ 评估这种危险是否存在不能仅仅依据理论或怀疑。还有必要呈现表明危险严重的事实。缔约国随后援引同一份一般

⁵ Human Rights Watch, “They Know Everything We Do – Telecom and Internet Surveillance in Ethiopia”, 25 March 2014.

⁶ 见 Sonko 诉西班牙案(CAT/C/47/D/368/2008)。

⁷ Z.Z.诉加拿大案(CAT/C/26/D/123/1998)，第 8.5 段。

性意见的第 49 段，指出应参照必须加以考虑从而得出结论存在这种风险的各种信息审议申诉人的案件。

4.2 缔约国认为，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本身并不构成可以认为某人在返回来源国后会遭受酷刑的充分理由。委员会必须确定申诉人本人在将被遣返的国家是否面临酷刑风险。⁸ 为《公约》第 3 条的目的，必须列举其他理由，才能证明酷刑风险是“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的。⁹ 缔约国指出，评估酷刑风险的依据不能只是单纯的理论或怀疑。

4.3 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总体人权状况，联邦行政法院援引其关于埃塞俄比亚局势的重要裁决¹⁰ 称，局势已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自奥罗莫族的新总理阿比·艾哈迈德 2018 年 4 月上任以来，总理打算通过确保所有政治力量的参与来加强民主。尽管该国继续经历民族冲突，可以假定整体政治局势向好。与抗议歌手 Hachalu Hundessa 之死相关的 2020 年 6 月和 7 月的动乱不改变这一判断。尽管如此，埃塞俄比亚的总体局势并不以战争包括内战或普遍暴力为主要特征，战争、内战或普遍暴力会导致平民整体堪称陷入切实的危险状态。此外，法院强调，不能假定申诉人在其来源国是政治迫害所针对的受害者。申诉人也不能准确解释具体何人威胁迫害他和这当中的原因。

4.4 关于申诉人的政治影响力，联邦行政法院指出，无论其关于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指控是否可靠，他在出国前在其来源国平安无事地居住了好几年。申诉人不能有说服力地证明自己在离开该国期间被有关部门寻找的说法。此外，他强调的流亡中的政治活动不足以表明他形成了高度政治影响力。尽管由于在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外发生的抗议，他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不能认为他因此被视为对埃塞俄比亚政府构成威胁。

4.5 缔约国强调，《公约》的缔约国在评估特定申诉人一旦回到其来源国时可能受到酷刑的危险时，有义务审议近期的酷刑或虐待指控和这方面的独立证据是否存在。缔约国指出，在其来文中所载的陈述中，申诉人没有声称遭受过酷刑或虐待；他只在主张他根据《公约》第 3 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声称自己遭受酷刑，但并未提供任何进一步信息。在国家有关部门面前他也没有声称受到过此类对待。

4.6 关于申诉人在其来源国的政治活动，瑞士有关部门指出，申诉人于 2005 年获释后在其来源国居住至 2012 年，尽管他有工作并与有关部门有联系，并没有躲藏起来，却没有被有关部门找过麻烦。因此可以认为，申诉人宣称曾在获释之前受到的迫害不再相关，无论其申诉是否可信。瑞士有关部门还认定，指称的 2004 年和 2005 年的事件并未促使申诉人出逃；如果因这些事件而出逃，他本应更早离开他的国家，而不是在 2012 年，这一年他的雇主计划离开，出售了自己的商店，导致申诉人失业。联邦行政法院认定，申诉人离开其来源国是由于后一个原因，因此他对迫害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申诉人能够在其来源国居住数年而不被有关部门找麻烦，表明有关部门并不关注他。此外，申诉人本人说，他在 2005 年被捕以来，在来源国不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⁸ K.N.诉瑞士案(CAT/C/20/D/94/1997)，第 10.2 段。

⁹ 同上，第 10.5 段，以及 J.U.A 诉瑞士案(CAT/C/21/D/100/1997)，第 6.3 和第 6.5 段。

¹⁰ 联邦行政法院，第 D-6630/2018 号判决，2019 年 5 月 6 日。

4.7 关于申诉人在瑞士的政治活动，缔约国指出，他在第二份庇护申请中宣称自己是埃塞俄比亚驻瑞士人权和民主工作队的成员。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在其 2015 年 9 月 7 日的决定中认定，在最终形成联邦行政法院 2014 年 9 月 18 日决定的庇护程序中，申诉人本可以提起这些申诉，但并未提出。秘书处得出结论认为，提出这些申诉是为了推迟递解，并重申，根据瑞士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定，申诉人在出国时不在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的关注范围内。秘书处认定，不能假定申诉人在瑞士一直受到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的监视。秘书处还指出，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只有在一名个人的活动被视为威胁政治制度时才有兴趣查明其身份。此外，身为上述工作队的成员本身不足以构成理由认定申诉人有被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迫害的风险。申诉人既没有表明也没有可信地论证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知晓这些活动。秘书处认定，申诉人肯定不是该国政权关注的流亡反对派的“核心部分”的一员。因此，秘书处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不太可能因其流亡中并非特别引人注意的政治活动而被其来源国有关部门认定为威胁。

4.8 缔约国指出，瑞士庇护主管部门确定，申诉人对其离开本国原因的说法不可信。由于申诉人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间在其来源国居住而没有被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找麻烦，它们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关于 2004 年和 2005 年的事件导致他出逃的说法不可靠。瑞士有关部门还认定，无论其申诉是否可信，申诉人宣称在其指称的获释之前那段时间遭受的迫害不再相关。

4.9 关于申诉人担心递解会导致他严重心理压力的申诉，缔约国指出，在国内程序期间，申诉人没有提交任何医疗记录证明其健康状况，也没有提交给委员会。他提到的精神问题与他在瑞士的庇护申请被拒绝有关，不能归因于他来源国的迫害。

4.10 最后，缔约国强调，申诉人没有向国内有关部门就递解的情形提出申诉，因此这些申诉不可受理。缔约国因此认为，申诉人并未证明，如果被送回埃塞俄比亚，他有实质理由担心自己有受到酷刑的实在和针对个人的危险。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22 年 1 月 24 日，申诉人辩称，缔约国未能告知对四级递解提出异议的方式，在实践中，瑞士有关部门不告知寻求庇护者或其代理人递解的方法、预计强迫措施的程度、航班日期或其他细节，据他说，他是碰巧从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发送给州有关部门的一封电子邮件副本中获知自己的递解将是四级递解。由于没有这方面正式通报，申诉人认为，缔约国既不希望申诉人能获得补救，也没有提供补救办法。

5.2 申诉人反对缔约国对埃塞俄比亚局势的分析，它不以任何报告为依据。尽管申诉人并非来自冲突中的提格雷地区，冲突已蔓延至全国。¹¹ 事实上，自申诉人提交其来文以来，局势已有恶化。2021 年 11 月 4 日，埃塞俄比亚政府授予自己紧急权力，¹² 使其可以任意限制人权并威胁司法独立。显然，鉴于埃塞俄比

¹¹ 联合国新闻，“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和非洲之角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2021 年 11 月 8 日。

¹² Declan Walsh and Simon Marks, “Ethiopia declares state of emergency as rebels advance toward capital”, New York Times, 2 November 2021.

亚脆弱的局势和上文所述的申诉人的政治影响力，他如果被送回埃塞俄比亚，受到酷刑的风险很高。

5.3 申诉人表示，他在入狱期间遭受酷刑，在提交瑞士有关部门的申诉中也同样作了解释。此外，瑞士有关部门并未对这些申诉提出质疑。

5.4 申诉人辩称，他避免再次入狱的唯一方式是在 **Negele Borena** 躲藏起来。如果被送回埃塞俄比亚，由于他现在已经被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视为持不同政见者，他将无法继续躲藏。他在流亡中是埃塞俄比亚政治群体的活跃成员；否则，在日内瓦的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外不会发生支持他的示威活动。因此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很清楚他的政治活动，这些部门自这些示威活动以来一直关注他。此外，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已对他发出逮捕令，尽管缔约国质疑其证据价值。

5.5 最后，申诉人提及其健康状况，提交了一份 2022 年 1 月 12 日的医疗报告，报告称，除其他外，他因政治活动在埃塞俄比亚被监禁五年，并称瑞士警方试图以暴力手段将他驱逐，10 名瑞士警官攻击他，给他佩戴手铐，扭转了他的左臂并使其脱臼。医疗报告称，他身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和严重的反应性抑郁症。申诉人表示，他在埃塞俄比亚将得不到充分治疗，违反《公约》第 14 条。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 22 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

6.2 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除非能够断定个人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指出，在本案中，申诉人出具了一份据称由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发送给负责递解事务的州主管部门的电子邮件副本，其中说明了递解日期和他将被两名安报警官和两名押送警官陪同的事实。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对他所称的四级递解的批评。缔约国认为，这项申诉并未向国内有关部门提出。首先，委员会无法推测如果递解真实发生，申诉人被递解的方式。其次，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仅称不存在国内补救办法，但并未声明他是否曾尝试就其递解的条件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或查明是否存在对此提出异议的任何方式。尤其是，申诉人没有解释，他在碰巧获知自己所描述的递解方式之后，为何没有在决定递解条件的有关部门处采取任何步骤。委员会强调，仅仅怀疑国内补救办法能否成功或其有效性并不能免除对申诉人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义务。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这项申诉不可受理，因为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6.3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直到评论缔约国的意见时才宣称他根据《公约》第 14 条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因此这项申诉不是缔约国应邀就其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作出评论的申诉之一。申诉人没有表明为何不能在程序的更早阶段提出这项申诉。因此，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委员会认定这项申诉不可受理。

6.4 但委员会认为，申诉提出了《公约》第 3 条下的实质性问题，这些问题应根据案情实质进行审查。委员会认为在受理方面不存在进一步障碍，因此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实质。

审议实质问题

7.1 委员会依照《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参照当事各方提供的所有材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在本案中，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送返埃塞俄比亚是否会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3 条承担的义务，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则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至该国。

7.3 委员会必须考虑是否有充分理由认为返回埃塞俄比亚后申诉人本人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在评估这一风险时，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3 条第 2 款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然而，委员会回顾，做出这种确定的目的是查明有关个人在其将被遣返的国家是否会面临针对个人的、可预见和真实的酷刑风险。因此，一国存在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本身并不构成可以认定特定人士回到该国后将有遭受酷刑危险的充分理由。还必须提出其他理由证明当事人本人面临风险。反之，不存在一贯公然侵犯人权情况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其所处的特定情况下不会遭受酷刑。此外，委员会指出，由于埃塞俄比亚并未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1 款作出声明，如果申诉人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在该国遭到侵犯，他将丧失要求委员会提供任何保护的可能。¹³

7.4 委员会援引其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其中指出，评估酷刑风险时，所依据的理由必须超越纯理论或怀疑。虽然不必证明这种风险“极有可能”发生，但举证责任一般由申诉人承担，申诉人必须提出可以论证的论点，证明其面临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的风险。¹⁴ 委员会还回顾称，根据其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委员会相当重视有关缔约国机关的事实调查结论，但同时委员会不受这种结论的约束，而是依照《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有权考虑到每一案件的全部相关案情，自由评估所掌握的资料。¹⁵

7.5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宣称因政治活动在埃塞俄比亚受到监禁和酷刑，并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被签发逮捕令。委员会指出，首先，在其来文对事实情况的描述中，申诉人并未宣称过去曾受到埃塞俄比亚有关部门的酷刑。申诉人在他根据《公约》第 3 条提出申诉中，声称他在监狱中遭到酷刑，同时明确指出自己“遭到任意拘留和酷刑”，也是“酷刑和不人道待遇的前受害者”，但没有提供任何补充资料。委员会随后注意到，瑞士有关部门适当审查了据称来自亚的斯亚贝巴警察局的文件——申诉人并未向委员会提交该文件——的形式和实质内容，该文件意在证明申诉人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被签发逮捕令，而瑞士有关部门质疑其真实性。尤其是，委员会注意到，瑞士有关部门显然并未质疑申诉人关于自己 2005 年在埃塞俄比亚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说法的是否可信。但是，瑞士有关部门认为，申诉人宣称自己在 2005 年参与政治示威导致其入狱一个月又 20 天，是他于 2012 年逃离该国的直接原因，这一说法并不可信。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并未出具任何证明其申诉的证据。

¹³ Tahmuresi 诉瑞士案(CAT/C/53/D/489/2012)，第 7.7 段。

¹⁴ 见，除其他外 M.A.R. 诉荷兰案(CAT/C/31/D/203/2002)，第 7.3 段和 Dadar 诉加拿大案(CAT/C/35/D/258/2004)，第 8.4 段。

¹⁵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 年)，第 11、第 39 和第 50 段。

7.6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称，申诉人在瑞士的政治活动并非持续的高密度活动，不能被视为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威胁。此外，委员会注意到 2022 年 1 月 12 日的医疗报告，报告称申诉人身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委员会指出，申诉人并未解释这份医疗报告中提及的 5 年监禁和向瑞士庇护主管部门提及的 1 个月又 20 天的监禁之间为何存在差异。

7.7 在此背景下，委员会仍然指出，即使它接受申诉人过去曾遭受酷刑和虐待的说法，产生的问题在于，如果他被迫送回，现在在埃塞俄比亚是否有受到酷刑的风险。委员会还指出，根据其判例，通常申诉人有责任提出有论据的论点。¹⁶

7.8 委员会知道，在许多方面，埃塞俄比亚的人权状况仍然构成关切。¹⁷ 但委员会重申，申诉人来源国发生侵犯人权行为本身不足以让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在该国将面临针对其本人的酷刑风险。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有充分的机会向国家移民事务秘书处和联邦行政法院提供佐证和关于其申诉的更多信息。但是，依据提供的证据无法得出结论认为，他在埃塞俄比亚和瑞士参加政治活动会导致他返回埃塞俄比亚时面临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风险。

7.9 最后，委员会注意到在申诉人提出的复审申请中，一审法院提供的提交上诉的时限有误，这得到了上级法院的确认。但是，尽管申诉人未能获益于更长的法定时限令人遗憾，委员会注意到法院在其 2020 年 10 月 26 日作出的决定中的观点，即申诉人并未表明自己因此在法律上处于任何特定劣势，因为他显然得以撰写并提交上诉。

7.10 根据掌握的资料，委员会认为申诉人并未表明其政治活动足够重要，有可能吸引其来源国有关部门的关注，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一信息并未表明，如果被送回埃塞俄比亚，他将面临针对个人的、现实的、可预见和真实的酷刑风险。¹⁸

8. 因此，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提交的资料不足以证实他的说法，即如果被递解回埃塞俄比亚，他将面临可预见、真实和针对其个人的酷刑风险。鉴于委员会关于埃塞俄比亚当前人权状况的认定，¹⁹ 自联邦行政法院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作出决定以来状况似乎有所恶化，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在执行其递解申诉人的决定之前，应对埃塞俄比亚当前的人权状况和由 2022 年 1 月 12 日的医疗报告认证的申诉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彻底的评估。

9.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将申诉人递解至埃塞俄比亚将不会构成缔约国违反《公约》第 3 条的行为。

¹⁶ 例如见 S.L. 诉瑞典案 (CAT/C/26/D/150/1999)，第 6.3 段，M.M.A.K. 诉德国案 (CAT/C/32/D/214/2002)，第 13.5 段，Zare 诉瑞典案 (CAT/C/36/D/256/2004)，第 9.3 段，C.A.R.M. 等诉加拿大案 (CAT/C/38/D/298/2006)，第 8.10 段，以及 N.B.-M. 诉瑞士案 (CAT/C/47/D/347/2008)，第 9.9 段。

¹⁷ 见 CAT/C/ETH/CO/2。

¹⁸ 例如见 M.K. 诉瑞士 (CAT/C/60/D/662/2015)，第 7.8 和第 7.9 段，以及 D.R. 诉瑞士 (CAT/C/63/D/673/2015)，第 7.9 段。

¹⁹ 见 CAT/C/ETH/CO/2。